

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

雷 鸣^{*}

〔摘 要〕 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语境中,“文革”历史在可资写作的同时,亦成为了消费娱乐的文化资源。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革”叙述在书写方式与表达策略上,呈现出鲜明的消费主义话语形态。以“性+革命”作为想象“文革”历史的一种定式,渲染文革时期“性爱奇观”;回叙“文革”的青春记忆时,聚焦于重构自由快乐与浪漫纯情的青春镜像,透露出浓郁的怀旧心态;把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予以“消费编码”和“温情化”处理,亦是对当下小资情调的同步归趋。这种受到市场与消费主义规约的“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历史深度反思的缺失,亦放逐了对苦难与创伤的追问。

〔关键词〕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革”叙述;消费主义;市场;怀旧;小资情调

“文革”叙述,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绵延不绝的题材选择与创作路向。伤痕、反思小说,从现实政治层面,专注于对“文革”创痛的展示,对那段特殊年代的历史反思;紧随其后的寻根小说,则从文化的视角,探掘文革的历史起源与民族心理、传统文化的深层关联;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表达的是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人,追求人性自由和主体性创造的“情绪历史”;先锋小说则以象征化、隐喻化、寓言化作为叙述策略,展开对“文革”的回叙与精神创伤记忆的书写。不难看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革”小说,尽管切入“文革”的视野不同,但“灾难性质”、“创伤记忆”、“历史反省”,却是它们共有的关键词。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①。文学亦必然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形塑。为了迎合文学市场的这种消费主义需求,小说对“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多呈现为祛除了政治动荡之日常生活化的历史,甚或成为一种可资怀旧的青春记忆。本文以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为中心,考察其“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探讨话语背后的规约因素,由此进行必要的清理与反思。

^{*}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071002。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互动关系研究”(15BZW169),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之关系研究”(HB15WX033),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媒介文化视域下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2015030527)的阶段性成果。

^①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一、一种定式：“性+革命”的想象方法

通常说来，在政治极度渗入日常生活的社会体制中，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模糊，彼此纠缠、混合在一起的。在公众领域里揭示个人的无意义，在私人领域透视政治的残酷与可笑，是对政治批判的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或许正是基于此理，从性的角度揭示“文革”的荒诞，以性的本能欲望消解“文革”的政治意识形态，从而质疑“文革”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成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小说“文革”叙述套路。此种将性与“文革”嫁接的书写路向，最早应溯自新时期之初的张贤亮，他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将食物与性的双重饥饿引入作品，以揭示性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幽微勾连。如张贤亮本人所说：“我想通过一个人性的被扭曲，不仅在心理上扭曲，而且在生理上也被扭曲，来反映一个可怕的时代，告诉世间这样的时代不能再存在下去。”^①在政治乍被解禁之际写性，不能不说，张贤亮有着冲决禁欲主义的先声意义，乃首次“吃螃蟹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革”小说，则为这种性与“文革”的写作模式，注入了更深厚的思想与文化的含量，虽然多是戏谑式的叙述，但没有铺陈“性景”奇观，在这些文本中，“性”构成了反抗权力压抑与个人主体性的文化隐喻。但阅读新世纪一些“文革”叙述的长篇小说，我们却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小说一涉及“文革”的书写，多以“性狂欢、性压抑、性怪癖”作为切入“文革”历史的惯常路径。“文革”在诸多作家笔下，不仅嬗变简化为一段各色性话语交集的历史，且作家们在舞弄这性话语之“三板斧”时，似乎有跳团体操的趋向，每个人所用的套路都如出一辙。

套路之一：书写性狂欢与革命的同构互动。作品中主人公性欲的高涨与革命的狂热往往“无缝对接”。阎连科《坚硬如水》中的复员军人高爱军和他的情妇夏红梅造反夺权的“革命”行为，始终与他们性行为缠绕在一起，越是“革命”的高潮，他们的情欲就越需要发泄。柯云路的《黑山堡纲鉴》主人公刘广龙革命（造反夺权）的过程，就是占有女人的过程，对不同女人的占有，成为其革命胜利的成果标示。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都写到了主人公喜欢在地道中做爱，地道作为当年革命的产物或工具，被革命狂人视作性爱的舞台或空间，可以看出作家以此书写性爱与革命互动的良苦用心。还有刘醒龙的《弥天》中的“革命狂人”乔俊一认为性欲就是革命（修水利）的最大动力。

套路之二：以“偷窥”与“偷情”作为不可或缺的情节佐料。为表现“文革”中的性压抑及对人性的戕害，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偷窥”就是“偷情”，或者偷窥别人之偷情（尤以子女偷窥父母偷情最为多见）。余华的《兄弟》（上）便是以混世魔王李光头偷窥女人的屁股为开篇。东西的《后悔录》则以众人偷窥围观两只花狗的交配作为小说的第一个场景，小说还多次写到主人公曾广贤偷窥父亲与女邻居赵山河，母亲与何园长的偷情。与此相同，叶弥的《风流图卷》亦叙述了主人公偷窥父亲与张柔和、母亲与仲代表、奶奶与老丝瓜的偷情。程青的《十周岁》中10岁少女唐冬青也窥视到了父母双方各自的偷情。叶兆言的《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通篇是蔡学民与谢静文、丁香、小鱼等几个女人的偷情史。

套路之三：“性怪癖”行为的同质化展示。首先，诸多小说均津津乐道于叙述“文革”中人物奇特的性行为，即以某种革命符号当作诱发春情的最佳情境，革命政治符号的在场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催情剂，媾和必须借助革命化的情境完成。譬如多部小说都有人物喜欢在革命歌曲和革命口号中、或领袖像旁边疯狂做爱的情节。《坚硬如水》中的高爱军和夏红梅，一听到革命歌曲、口号，就春心荡漾，性欲亢奋。其次，人与兽交的怪癖亦是高频率的复现。例如，毕飞宇的《平原》则叙述了“铁姑娘”吴蔓玲与狗的亲热，右派老骆驼与母猪的性交，等等。

^①张贤亮：《张贤亮答香港记者问》，《新民晚报》1986年3月31日。

展示这般性狂欢与性压抑的悖论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确然能映射出“文革”时代人们特殊的精神处境:在革命狂热的年代,源自生命本体天然需求的欲望与性,在绝对革命的名义下遭到彻底的淘洗与放逐;而过度的政治压抑,必然激起人们的反叛,而这种反叛往往始自欲望和性的释放。诚如殷国明所言:“在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中,性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忘却,可以暂时摆脱压抑,摆脱追问,承受任何生命之轻——这也是我们所有卑微的人之所以还能活着,并时而快乐的原因……如果社会机制和文化的‘绳’、‘法’、‘规矩’多度严酷,伤害到了人本能,或者以牺牲人的身体为代价去成全所谓的‘理想’和‘文化’,那么,人们的‘身体’就会自动做出反叛的举动,并策动人们的精神意识也进行反叛,最后爆发革命”^①。但不同小说都设置“家族相似”的性情节,都以所谓凸显人性因素的“性景奇观”,作为进入“文革”历史之“芝麻开门”的口令,其背后的诉求,实乃应和消费时代的读者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窥秘心理,使市场化时代的人们追逐欲望得到想象性的满足。波德里亚指出:“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②。性欲膨胀,偏嗜感官享乐,正是消费主义文化的特点。由此足见,小说把“文革”历史彻底置于性爱关系的斑斓场景当中,连篇累牍的是性因素的肆意铺排与直露渲染,“文革”被强行拉进“一个(性)狂欢的场所”^③,创伤记忆置换为特殊时期的“性景奇观”,正是为了迎合市场的消费主义需求。这样,当性化的“文革”历史,沦为了以满足读者的欲望化想象的一种“消费品”之后,则不可避免地删削了“文革”历史的复杂与丰富,恰如有论者指出:“相似场景的反复渲染,在热烈而夸张的气氛中,遮蔽了喧嚣的泡沫下面真正有力量有深度的漩涡和暗礁、险滩和恶浪……自然也无法成为解剖文革的坚实的基点。”^④

二、怀旧与补偿:美化的青春物语

早在新时期之初,表现青春少年在“文革”中遭际经历的小说不乏其作,但是绝大多数作品侧重于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揭露“文革”对青少年一代所造成的“精神内伤”,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如众所周知,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随后的知青文学,亦有不少作品侧重叙述知青们在农村的成长历程,多浓墨重彩地渲染青春记忆中的苦难无边,饱含着悲情与血泪,其基调依然是对“文革”之呈示与反思。

1991年,王朔发表小说《动物凶猛》,则颠覆了此类“文革”青春的悲情记忆,呈现出在特殊历史时期,一群青春少年酣畅淋漓、恣意快活的成长镜像。小说讲述了文革后期北京某部队大院中的一群少年的成长故事,趁着大人们忙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孩子无人管束,他们如鱼得水地体验着青春生命的快感,偷窃、斗殴、偷看黄色手抄本,勾引漂亮女孩……革命没有禁锢他们的为所欲为,他们总是游刃有余。作者笔下的“文革”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的社会动荡仿佛是催生青春自由快感的“润滑剂”。

王朔书写“文革”的浪漫青春物语模式,全然被新世纪作家所承袭,几乎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之青春“文革”书写的“葵花宝典”。不少作品倾向于悬置文革时期的社会立体图景,滤除以往同类作品中的苦难与忏悔意识,醉心于以“文革”为背景,重构一些充满戏剧性、浪漫情怀,又颇富刺激与诱惑的青春镜像。其一是青春的自由快感化。这类小说在重组文革记忆的过程中,剔抉了青春成长在特殊

①殷国明:《女性欲望与革命文学的关系》,《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②[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

③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69页。

④张志忠:《从狂欢到救赎:世纪之交的文革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时代的困惑之思,侧重于演绎“文革”岁月中青春的激情与放纵,自由与快感,把时代的颠簸之痛柔化为对青春另类往事的迷恋与怀想。与《动物凶猛》相同,都梁的《血色浪漫》书写的“文革青春”亦是阳光灿烂,浪漫氤氲,还是一些大院子弟,钟跃民等人趁着大人忙于“闹革命”无暇顾及,他们游手好闲、溜门撬锁、“练架”(打架)、“插人”(用刀子捅人)、“吃佛”(盗窃)、“拍婆子”(搞对象)、看芭蕾舞剧,到处撒野无法无天,挥洒青春的无拘无束。血色的历史已沦为无足轻重的背景,既无控诉之意,亦无反思之心,本应是令人深思的残酷青春,却弥漫着波西米亚式的自由不羁。高满堂的《北风那个吹》没有了知青小说常见的豪情与悲壮,相反地充满了戏谑化的喜剧色彩,下放的知青们在冰天雪地里赶猪,杀猪前给猪举行追悼会,看露天电影,乔装成农民夫妇向医生骗取避孕套,生活充满那个时代特有的游戏、刺激元素。为何历史苦难带给青春的阴翳,化作了轻松游戏的虚化;残酷青春嬗变为“阳光灿烂”的美好回忆?“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一种表示都不能孤立地看,他们的每一个都处在与别的表示、别的境况、别的动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复杂与矛盾的对照中。”^①这类小说之所以把苦闷压抑、焦虑迷茫的“文革”青春故事,置换成纯然一色的“青春狂欢曲”,不能孤立地看作是作家叙事姿态的特立独行,或者为创作主体本身的青春纪实,其实是消费主义逻辑使然。迈克·费瑟斯通指出:“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②。与此类似,丹尼尔·贝尔也有过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③。也就是说,追求快感与欢乐是消费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在这点上,当代学者陈晓明说得更为直接,他曾将消费文化归纳了五个特征,其中包括:“必须提供快感。虽然快感与美感有区别,似乎是低等的,动物性的,但80年代后期,就不再把快感和美感断然划分开了,而且也不再去压制快感了……”^④。追逐快感,注重享乐,拒绝忧思,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与基本逻辑,对“文革”青春的自由快感化处理,恰是与这种消费主义逻辑亦步亦趋。正是通过对“文革”记忆的“选择性”快乐重组,实现读者对“文革”时代的消费:游戏心态,体验狂欢以及对自由、快感的张扬。

其二是青春的浪漫纯情化。“在1950年代,人们还闷在无情的清教徒信仰里,之后不过十年时间,一切都变了——初次调情与性爱之间广阔空间消失了。人和性之间不再有感性的无人地带作为保护,人直接与性对阵,此事已成定局”^⑤。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市场化后的中国情境,市场法则深度引爆了国人对金钱的攫取欲望和对世俗生活的享乐期待。金钱与性的追逐成了爱情婚姻的原动力,为爱情守望的乌托邦想象,以浪漫纯情作为爱情观与生活态度,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早已难觅踪迹。莫林格尔说“创作就如同做梦,并且像做梦一样,它被看作是冲突的一种解决方式”^⑥一些小说通过选择和重塑“文革”青春的浪漫记忆,倾心描摹爱情的纯粹质地,以唤起大众关于那个特殊年代的青春爱情的遐想与向往,这正是“冲突的一种解决方式”,或曰,作家们基于现实缺陷的想象性自慰和修辞性补偿,而对当下消费文化语境的串接和市场需求的应和。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的少女小侑子爱得单纯而坚定,虽然数学老师江远澜,与她在年龄、个性、情趣差异极大,但她依然坚定地喊出“你就是一百岁,一千岁,一万岁我也会嫁给你”的誓言,她对江远澜那份感情,一直都没有变,直至江远澜死去。蒋韵的《隐秘盛开》也讲述了发生在“文革”中的一种神话般的爱情。曾经目不识丁的村姑潘红霞,被插队的知青播下浪漫主义种子之后,坚守着浪漫的爱情理想,

① [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②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③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17页。

④ 陈晓明:《消费时代的文化走势》,《中国文化报》,1994年1月9日。

⑤ [捷克]米兰·昆德拉:《加速前进的历史里的爱情》,《相遇》,尉迟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1—32页。

⑥ 转引自王先霏、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39页。

她如宗教信徒般忘我地爱着那个男人,却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很多年后音讯全无,她却爱了他一生,至死,激情未减。这样澄澈又炽烈的爱恋,这样守望爱情信念的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然踪影匿迹。把“文革”青春浪漫纯情化处理,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堪为极致的适例。小说努力回避“文革”的现实,而侧重讲述文革背景下类似“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爱情故事。英俊而有才气的老三,爱上了家庭成份不好的静秋,静秋躲闪回避,但老三仍甘愿为静秋做任何事,傻傻痴痴地爱着,等着。等到静秋所有的心愿都成了真,老三却得白血病去世了。对于当下“纯情”稀缺的情感消费领域而言,艾米笔下“老三”,是一个令所有女人魂牵梦萦,绝无仅有的“完美情人”形象,暗合着物欲膨胀下的人们对一种纯真美好感情的怀想和补偿心理。

综上所述,这些重返“文革”青春现场的小说,青春的印记,更多的是自由与快感、浪漫与纯情,而有意遮蔽了窒息与压抑,苦难与创伤。“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①此时,作家们所记忆的青春物语中唯有自由快乐、浪漫纯情,正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联系中国的实际,这与当下民众的怀旧心态有关。所谓怀旧“本质上就是对这一‘动摇’和‘困惑不解’的应对,是现代入用以稳定自身的心灵平衡、重新寻得某种灵魂归宿感的自我防御机制”。^②换言之,怀旧其实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回溯与记忆的遴选,为现实的失落与缺憾,寻求精神慰藉和想象满足。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漩涡里,许多美好的事物都已流逝,在物欲与拜金狂潮的裹挟下,许多人面临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自由、纯情已成稀见元素,为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缓解焦虑,怀旧亦就成为了必然;而文革经历作为作家生命印记中不可磨灭一部分,重构当下现实所匮乏的自由快感、浪漫纯情的青春物语,以此作为一种精神补偿,自然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恰如戴锦华所言:“任何一种怀旧式的书写,都并非‘原画复现’,作为当下中国之时尚的怀旧,与其说是在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③。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小说对“文革”青春记忆不是被固化保留下来的,而是在当下消费语境中被不断重新建构的,是一个不断筛选与重塑的过程。诚如波德里亚对文化消费的分析:“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而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成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④较之从前的苦难悲情的文革记忆,而上述小说的“文革”青春叙述正是这“第二次”,这种“第二次”,所消费的是基于当前语境所消逝的事物以及由此所唤起的对那个时代记忆的一种享受,亦即中老年人以此遥想往昔的青春岁月,青年人则以之为满足对那个年代的猎奇心理。由此,文革中青春记忆具备了被消费的可能,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种表象。

三、小资情调:赋魅的日常生活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的增长”^⑤,其结果是:“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⑥。在这个仿真世界中,艺术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庸常的日常生活事物戴上了艺术和审美的面具,生活即审美,审美亦

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②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页。

③戴锦华:《隐形的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④[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⑤⑥[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1、98页。

是生活。正是消费社会中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推动着文学日常化叙事的流行,中国当代文学也就越来越倾向于日常生活的写作,新写实小说对吃喝拉撒等生存本相的揭示,新生代小说对原生态欲望的张扬,女性作家的“私人化”写作的兴起,正是此种文化征候。

许多作家以日常生活作为切片,书写“文革”也正是这一语境下的产物,他们不再致力于重现“文革”时期的革命与激情,亦不再聚焦于苦难与血泪的回忆,而是将“文革”淡化为一个或隐或显的背景,凸显动乱年代中的普通人远离政治狂热,热衷于平凡日常生活中的主题,力求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筑起一个个“文革”故事。客观地说,以日常生活切入“文革”的书写方法自有其合理性,既开辟了文革题材小说的新向度,又能深化对文革复杂性与特殊性的认识。洪子诚就曾认为,忽视普通人日常生活,是以往小说“文革”叙述的一大缺憾。“在那几年的作品中,我读到不少对苦难和伤痕的撕心揭发和控诉,也读到不少有关与邪恶力量斗争的英雄的记述。在一些作品中,人们被清楚地区分为正反两个阵营;在另一些作品中,所捍卫的某些抽象观念,是作家用来规范人的生活的法则……我当时产生一种模糊的想法,如果上面的那种‘历史叙述’有它的道理的话,那么,也应允许有其他的叙述,即使后者作为‘补充’也罢。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在‘文革’中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痛苦和希望,似乎有着别一种的形态。”^①但是,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分析市场化文学时所言:“在形象之中,暗含着与大众最隐秘的需要千丝万缕的联系。形象只有指向大众的情感和潜意识,才能够被大众选择和消费”^②。在消费社会中,一切文化产品必须满足接受者的某种消费需求,才能在文化市场上具有交换价值,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受众消费的内容,与当下受众消费心理相通,才能实现文学作品的消费性需求。正是为迎合受众的消费心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对“文革”日常生活化叙述时,不遗余力地精心地选择和编排那一时期的日常生活。作家们煞费苦心地为当下读者“编码”,不写日常生活本身的重复与粗糙,不写动乱日子的慌张与匮乏;而是赋予冷酷岁月中的日常生活以“精致优雅,温情脉脉”的魅力。很显然,日常生活这般“精致优雅,温情脉脉”等特征,恰好与当下都市流行的“刻意追求精致高雅的生活品味,讲求生活细节,善于营造浪漫气息,追求休闲享受,精神上标榜自我,张扬个性自由,带有自闭自恋式的孤芳自赏等特征”^③的“小资”情调^④是直接相通的。具体而言,勾连“小资”情调的叙述策略有两种:

一是回避历史,将日常生活符号化。对于“小资”,米尔斯有过精辟的论述:“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方向和‘政治冷漠’自成一类。他们……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⑤简而言之,小资这一阶层的总体特征是:虚无对待历史、政治冷漠,耻言理想与个人责任,专注以消费显示身份与格调。而这类小说通常搁置日常生活本身在动乱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的性质,抽离或滤除“文革”对彼时日常生活的丝毫介入和印痕,转而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重新书写,通过堆砌具有“符号象征意义”^⑥感性直观的消费品,使小说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及主人公的生活状态与价值取向,十分吻合当下中国都市“小资”们的所思、所想、所为。王安忆发表于90年代的《长恨歌》就初显端倪,小说刻意回避“文革”对王琦瑶日常生活的影响,而重点叙述王琦瑶们能躲进宁静的一隅,营造出情趣丰盈

①洪子诚:《读〈鼠疫〉的记忆》,《文学与历史叙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②[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③袁梅:《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小资”和“小资情调”》,《齐鲁学刊》2005年第5期。

④本文所指小资情调,是文化范畴内的审美概念。特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兴起于都市,代表着都市中间阶层中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中上的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

⑤转引自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79页。

⑥[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30页。

的私人空间,花着心思调制清爽可口的家常菜,翻新点心花样,裁制时尚的服装。与此类似,叶弥发表于2002年的《美哉少年》写李不安一家从花园洋房下放到农村后,整日地心安理得地琢磨着西瓜鸡的做法,想着“椒盐排糕”、“五仁枣糕”、“花生香糕”的菜谱。王刚的《英格力士》,突出了文革岁月中,英语教师王亚军听古典唱片、穿毛料衣服、喷香水、抹雪花膏的“绅士”生活。显而易见,这些“文革”日常生活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有意遮蔽了动乱年代的政治浊流对日常生活的冲击,稀释了动乱时代下的人之不幸与悲伤,相反地,充斥着区隔身份与地位的消费符号,如“花园洋房”、“西餐”、“西瓜鸡”“古典唱片”……正是这些能承担社会等级和社会区分功能的“消费符码”,显示出体面、精致、优雅和悠闲的文化氛围追求,这与当下都市“小资”们所追求的生活格调如出一辙。日常生活果真能彻底祛脱历史的形迹吗?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一个层面,它是欲望与需求、重大与无意义、自然与文化、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交汇点和碰撞点;是宏观和微观、个体和社会关系的集散地。”^①重大历史事件就孕育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实现的。所以说,日常生活虽然属于私人关系,但又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时代的细节和碎片必然投射其中。悬空历史语境,把“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予以消费编码,这样“日常生活的长河似乎失去了历史纵深感,被挤压成在一个平面上展开的、按固定的程式翻转变化的风景图。”^②当然,这个文革日常生活“风景图”只能是按当下都市“小资”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意识的程式而展开的。

二是拒绝批判,日常生活的“温情主义”。学者孟繁华曾有一段话,极为精彩地分析了中国“小资”们的心态:“一个不再需要激情不再产生焦虑的阶层,在拥有话语权力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被置换成全社会的普遍状况,它以狂想的方式和霸权的语调,试图建立文化白领话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它以虚假和极端片面的描述,把今日中国描绘成‘后现代’已然来临,所有人都享受于‘后现代’的无比丰盈和温情之中……他们将自己的温情生存诉诸于全社会共同体验和共有财富,这就是他们认同现实的最大依据”^③。换言之,“小资们”的趣味,就是对温情脉脉的生存话语实践乐此不疲,放弃批判精神,放弃忧患、焦虑和怀疑。我们发现,有些作家在回叙“文革”往事时,不再“金刚怒目”式地描写文革经历,亦不拷问文革浸入日常生活所引致的精神戕害;而是有选择性地聚焦于“文革”日常生活所盈溢的温情和诗意,把动乱年代的日常生活涂抹得温馨甜软,充盈着暖洋洋、乐陶陶的气息。如此,不能不说是借人们窥秘“文革”的心理,对“小资们”所尊崇温情主义的一次文学化的生动诠释。他们要么表现小人物所秉持的良好道德和美好人性,在日常生活中给予落难者的温情关怀,突出最温暖、最淳朴的人性一角,如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少女记忆中的“文革”日常生活场景,泛着馥郁的温暖底色,喧嚣的政治强力改变不了温暖亲情的厚重深沉,仅仅是生活一丝调剂且迅即消失。曹文轩的小说《青铜葵花》刻意展示了孤儿葵花与青铜一家日常生活中极为感人,充满温情的诸多细节,如青铜玩花样将上学的机会让给葵花,青铜牵牛送葵花上学,葵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教青铜认字,奶奶卖掉结婚时的金戒指补贴家用。黄蓓佳的《没有名字的身体》亦展现了男主人公对一个女孩不同成长阶段的温暖呵护。总之,作家对残酷不着笔墨,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这种“温情主义”路线,恰如吴志翔所言:“小资写作关心的绝不是那些有尖锐冲突、有大境界、有沉重内蕴甚至有焦虑和绝望的东西。”^④不写冲突、焦虑、绝望,迎合的是“小资们”渴望情感抚慰的心理需求,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革”历史创伤记忆,阻滞了人们对“文革”历史进行深刻与持久地反思。

①转引自陈学明:《列斐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②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

③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④吴志翔:《小资写作:消费社会的精神叛逃》,《北京文学》2001年第10期。

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切入对“文革”叙述,如何做到既展现“文革”的繁复性与复杂性,又不掩盖历史真实中的痛感与逃避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担当,贾平凹的《古炉》、毕飞宇的《平原》或许能给我们以正面的启迪。《古炉》同样是写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但作者没有作“符号化”与“温情化”处理,而是以白描的手法,叙述“文革”如何渗入到古炉村百姓的家长里短、矛盾纠纷等生存状态之中。由乡村日常生活的“异动”透递出“文革”对人心人性的侵蚀。《平原》则重点探掘了“文革”意识形态是如何潜藏在人们日常观念之中,作者虽然没有肆意渲染特殊年代的苦难,也无意掩盖“文革”所引致的乡村裂变,日常生活中普通小人物在政治淫威下的生命伤痛,令人唏嘘扼腕。

四、结语

“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个人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些记忆则变得淡漠或完全消失了。尤其是随着意义结构和评价模式的变化,过去重要的东西后来可能变得不重要了,而以前不重要的东西在回顾的时候却可能变得重要了。”^①的确,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在不同代际的作家笔下对“文革”的文学诠释,不可能是静止凝固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革”叙述显出诸多新变,其突出的表征之一,就在于对市场与消费主义的俯首:以性作为说解“文革”的“不二法门”;以怀旧心态美化冷酷岁月的青春记忆;以小资情调描摹“文革”日常生活的温情脉脉。由此而来,所伴生的负面效应,如对历史深度反思的缺失、对苦难创伤的遗忘等,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责任编辑:邓晓东)

Narra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 Focusing on Its Form of Discourse

LEI M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ization and consumptionism,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makes a worthy literary theme, which meanwhile becomes a type of cultural resources for consump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e narra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 has demonstrated a distinctive form of discourse featuring consumptionism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style and strategy. A fixed pattern of “sex plus revolution” is used to render the queer thoughts on sex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thus forming a constructed historical image of that particular period. While retelling the memories of youth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ovelists usually focus on reconstructing a mirror image of youth filled with freedom, happiness, romance and innocence, showing a strong sense of nostalgia. It is to some extent a pandering to the current petty bourgeoisie taste and mentality to turn the daily life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to a type of recourses for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us render it a rosy color. This type of discourse on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is curbed by marketization and consumptionism, leads to a lack of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and misses the chance to explore the sufferings and trauma people experienced at that time.

Key words: novel of the new century;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on; consumptionism; market; nostalgia; petty bourgeoisie taste

① [德]哈拉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